

第 101 回 李鸿章失意隐退 康有为毅然出山

话说光绪帝登基之前，大清国早有一位朝廷重臣显赫多时。此人正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元老，主持清政府内政外交数十年的一代权臣李鸿章。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前期还颇思有所作为，也确实做了一些实事，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年龄越来越大，渐渐不思进取，锐气渐失，开始变为一个守业的老臣。

1884 年中法战争，李鸿章妥协求和，中国“以胜求和”，一时为舆论所诟，已经预伏甲午战败的祸根。

1894 年，中日甲午大战爆发，李鸿章仍然避战求和。这一次朝廷主战派已实力大增，向李鸿章发起猛烈的攻击。还在 1894 年 7 月底，战局尚未分明的时候，张謇等主战派已一再要求严惩李鸿章，撤换淮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由于海陆两路清军的失败，光绪于 1894 年 9 月 17 日颁旨，严责李鸿章“总统军务，通筹全面是其责任，竟然未能迅速调度，抓住战机，以致日久无功，实在辜负了朝廷对他的重任，着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李鸿章应当力图振作，督率各路将领，全力进剿，将功赎罪！”

这样的处分并未使主战派心悦诚服，因为他们认为：李鸿章是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能再掌兵权，非撤换不可。9 月 28 日，在京的翰林集会于全浙会馆，由文廷式执笔起草了奕訢重新秉政的奏折，署名者 57 人。在帝党和庆亲王奕劻的力谏下，慈禧太后不得不起用奕訢，让他再度主持总理衙门，并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员。由奕訢、奕

勳、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龄 6 人组成军务处或督办处，掌管军事外交大权。李鸿章开始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甲午中国战败，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惨败。李鸿章的政治资本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淮军也溃不成军。清廷统治层中，内而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一齐把满腔怨愤倾泻在李鸿章身上，形成“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势。对李鸿章的洋务“富强”术也大大加抨击。

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讽刺洋务运动，“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其他徇私弊端更是不胜枚举。”指出洋务运动不过是浪费国家巨款，不但救不了危败，反而成了日本侵略的借口。梁启超也指责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是“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大难临头，只有死路一条。”甚至认为洋务运动进行了数十年，“利未一见，弊已百出”，因而要求“真变”。严复也批评洋务派“徒劳无功”，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只增新而不变旧”，要求“全变”。

在内外夹攻之下，洋务派的富强之术已经黯然失色。所以战后“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的李鸿章不无痛苦地自嘲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我何尝能实在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一旦被人揭穿，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承认洋务的真相是虚有其表而已。广西臬司胡燏棻也感叹：“办理洋务以来，于今五十年矣，凡能致富图强的办法，都仿照西洋一一施行，但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变成苦味的枳子了。”

正在李鸿章受到各方攻击，焦头烂额，无处躲藏时，沙

皇尼古拉二世加冕，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赴俄专使，清廷只得应允，并要李鸿章顺访德、英、法、美各国，以重邦交。

李鸿章风尘仆仆，长途跋涉，访问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到之处，受到热情周到的款待，得到最高级别的礼遇，可谓出尽了风头。事后，他也得意地觉得：“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说外国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么一个人。……我在各国还有许多老朋友，以往都主持过国政，在办事和私交方面，我与他们都很投合，现在大多已经退居山林了，我顺便访问他们，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他本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换回甲午“受谤之辱”，重返直隶总督宝座，欧美列强也希望清政府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新给予大权”，使其东山再起。

然而，当李鸿章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国之后，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冷遇。1896年10月24日，光绪帝降下谕旨，命李鸿章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晚清的总理衙门是于1861年为适应与外国人打交道而设立的一个外事机构，名义上地位在北洋大臣之上，实际上这个衙门由奕訢、奕劻两个亲王主管，亲王之下连同李鸿章共有8个大臣。李鸿章属于随班朝请的没有什么实权的官吏，“仅其为伴食之宰相”而已。这个安排表明，李鸿章失去在清中央政权内的重要地位，从独当一面、把握水陆兵权、坐镇畿辅的重臣而一落千丈。就在李鸿章受命于总理衙门大臣任上行走的当天，清廷又以擅入圆明园游览之词，将李鸿章交部议处。原来，1896年10月21日，李鸿章来到北京曾便道径游圆明园，凭吊废国遗址。当时他并不知道圆明园正处在修复过程中，慈禧、光绪每隔数日必亲临督视，所以该园已经成为禁地了。最后，清廷给予李鸿章“加恩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的处分。这对处境狼狈的李鸿章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李鸿章被闲置于总理衙门后，深感“伴食宰相”的滋味不好受，决心采取“韬晦”之计，再也不要锋芒毕露了。他就安心居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中一个小胡同里的贤良寺，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这贤良寺本是一座庙，供奉着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孙武、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等忠臣良将，所以叫贤良寺。庙宇早已毁弃，地名依旧保留。李鸿章就居住在这其中一个十分讲究的四合院中。他在每天公务之余，常与几个幕僚枯坐庭院，说古道今，更多的时间总是默坐在落日余辉之下，回忆他的过去，思索如何“韬光养晦”度过晚年的问题。院外，北京城又重新热闹起来。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始，又一位风云人物登场了，这便是百日维新主角、大名鼎鼎的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怡，后改号更生，晚年自号天游化人、游存叟、游存父等。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在南海县西樵山北的苏村，故人称康南海。

康氏是一个大家族，世代书香门第，康有为自小便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还在孩提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曾手书一联：“大翼垂天四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以明示自己鸿鹄之志和孤高品质。年稍长，在祖父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及诗词古文，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旧学根底。在此期间，祖父还常带他游历山水名胜，陶冶性情，吟诗抒怀。第一次登临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所筑“画不如楼”曾写下一首七绝：

万松乱石先仙居，绝好青山画不如。
我爱登楼得高处，日看云气夜看书。

康有为 14 岁时，其叔祖，曾任广西巡抚的康国器辞官

回乡，于康氏老宅旁大兴土木，新筑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园林。园内古木参天，其中有七株数百年之桧，故称七桧园。康国器在康氏家族原来的藏书楼——澹如楼的对面修了一座新的藏书楼——二万卷书楼，内藏书数万卷。其中有不少当时出版的新书，这给康有为博览群书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每日晨起，康有为先拿来几本书放在桌上，然后用一把铁锥用力一扎，扎穿二本或三本，就是当天要读的书，每天读书以寸计。七桧园的苦读，为康有为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也就是在这里，康有为翻阅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翻译的西洋书籍，开始对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

康有为虽博学，但对八股文却很头痛，故科举考试一直不顺。他 14 岁时第一次参加童子试便名落孙山，无功而返，次年再试，依然未中。19 岁时，他去广州参加乡试，也榜上无名。这一次对已经成年的康有为刺激很深，使他愤学业之无成，决心寻名师从头开始。在祖父帮助下，康有为进入了当时广州名儒朱次琦（人称朱九江）创办的礼山草堂。

朱次琦也是南海县九江镇人，道光进士。提起九江先生，在广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公曾任山西襄陵知县，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因看不惯官场浮华腐败，愤而弃官，回乡办学授徒，执教 20 余年，不再出仕，虽朝廷累召而不出，高风亮节，硕德高行，博览群书，其品质学术在当时的广东首屈一指，为有清以来的一位理学大师。

礼山草堂的教学内容，在当时也别具一格。朱次琦的教学宗旨是“四行五学”。所谓四行，即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则为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内容广泛。良师言传身教，对康有为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礼山草堂三年，康有为系统研究了中国儒家经典，但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读书人。强烈的用世愿望，使他陷入苦思冥想之中，常常独自静坐，忽觉自己与天地万物混然一体，飘飘然如成圣人，于是欣喜万分，放声大笑；有时忽然感到天下苍生困苦，生灵涂炭，于是痛苦之极，放声大哭。同窗学友见他哭笑无常，怀疑他走火入魔，神经有问题，朱次琦也对他的狂放不羁产生不满，这使康有为心中茫然。于是他决意辞别尊师，独自一人到西樵山中，住进白云洞三湖书院。

西樵山风景秀丽，古木森森，奇花异草，幽谷深洞，是一片世外桃源。在西樵山北麓有一个山洞，三面峭壁，景色幽绝，洞中常白云缭绕，相传明代学者何白云即在此结庐读书。康有为在这里置身于大自然中，避开了人世间的烦恼，感到十分自在，常散发徘徊，枕卧松下泉石之间，夜坐辄弥月不眠，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以身试之。

康有为在白云洞昼夜研习佛道之书，长斋静坐，潜心佛学，深有所悟。但他并不主张看破红尘，远离人世。他认为应以智为体，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弃一切。他不赞成佛教将希望寄托于来生，而主张布施于现在；由于众生平等，因而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出家当和尚并不合于佛教普渡众生的道理。于是浩然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却说康有为在白云洞修行之时，正好有一位在京城做官的广东人回乡探亲，乘兴游览西樵，与康有为不期而遇，结下一段因缘，此人正是张鼎华。张鼎华，字廷秋，广东番禺人，小时有神童之称，13岁就登科入仕，曾在军机处任职，后入翰林院任编修。素以文学盛名于京师，被称为“神识绝人，学问极博。”

康有为与张鼎华山道巧遇，交谈几句，话不投机，康有为拂袖而去。但康有为不修边幅，气宇轩昂，给张鼎华留下深刻印象。游山归来他对人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遇一异人。”

康有为从友人处得知此人正是久闻大名的张鼎华，便给他修书一封，张阅后感叹：“粤中无此文。”康有为闻听此言，即下山往广州城拜访张鼎华，两人从此订交，常相谈至通宵达旦。康有为时时向张鼎华咨询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两人纵论天下大事，这使闻世甚浅，足未出过广东，长期埋头书本之中的康有为眼界大开。

1879 年秋，22 岁的康有为到广州寻师访友，一日独自登上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的越王台，放眼四顾，吟诗抒怀：

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龙蛇最可哀。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轮回？
腐儒心事呼天门，大地山河跨海来。
临倪飞云横八表，岂无倚剑叹雄才？

这位狂傲书生要出山了。

1882 年，康有为告别老母、妻女，第一次远离广东，踏上北去的征途，赴京赶考。康有为一路风尘，赶赴北京后，却整日里谒太学叩石鼓，瞻宫阙，购碑贴，讲金石之学，结京华名流，察京津形势，并未将精力用于科举考试的准备。因而大考放榜出来，自然榜上无名。但此次北京之行，却给康有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万里烟波回紫潮，五云宫阙耸丹霄。
津沽形胜曾全览，京国名流频见招。

看来康有为对科举落榜并不在意，反而觉得不虚此行。

大考结束，康有为取道武昌，顺江而下，游历了南京、扬州、镇江等处名胜古迹。又赴上海遍购西书，研习西学，满载而归，回到西樵山中。这时的苏村澹如楼小阁已显天地狭小。这时，正值中法战争之际。中国军队不败而败，令康有为痛心疾首。他希望以自己所学，小试牛刀。他通过好友张鼎华给张之洞写了一封信，建议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成立专门译书局，集中力量翻译西方有关政治书籍，以供中国改革参考。张之洞对此建议表示赞同，准备委托康有为和文廷式等人来筹备此事，但由于经费紧张，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影响，设立译书局之事搁浅。康有为进而向张之洞建议发展商业，张之洞觉得只是空谈，而无操作性，但仍认为康有为是一个人才，希望聘请他主持著名的教学机构三湖书院和学海堂。由于康有为既无社会地位，也无大的名望，不少人颇有微词。康有为乃愤而却之，仍回乡隐居。

1888年夏天，康有为的好友张鼎华再次来函邀康有为来京晤谈，正好这年秋天北京举行顺天府乡试，康有为决定再度赴京。等康有为兴冲冲赶到北京时，不料好友张鼎华已重病在身，不久病逝。

康有为在北京等待乡试期间，不是像一般士人那样埋头于书本，拼命背书练帖，拍马钻营，而是广泛结交一些开明官员和士人，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讲求中外事宜。

顺天乡试一结束，康有为如释重负。他不再为科举功名这样的小事操心，急切地想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他决定向执掌大权的朝廷官员靠近，以便向他们陈述自己变法改革的主张，并对朝廷产生影响。

康有为首先访的是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这是当时

颇有声望的汉族大臣，与康氏家族有世交之谊。对于这位素未谋面的世侄，潘祖荫不好不见。两人一见面，康有为便试探性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但久经宦海沉浮、老道圆滑的潘祖荫却以长辈身份教训康有为不要胡思乱想，要他熟读大清律例，不可贸然造次，轻言变法。并送给川资盘缠，要康有为尽快回广东乡下。

康有为快快不快，回到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左思右想，觉得心中未说出的话不吐不快，于是秉烛夜书，给潘祖荫写了一封长信，痛陈中国面临的危机，驳斥了所谓成例旧法不可变的说法，指出中国人心之固，君权之尊，实为世界各国所未有，因而中国一旦翻然图治，富强自立，将会令欧洲各国望而生畏。

怎么变法？康有为的想法还是依靠明君圣主。关键是要能感悟圣意，使翻然有欲治之心。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近皇上，都能向皇上进言，因而他恳请潘祖荫等元老重臣向皇上直言中国的内外危机，请求变法改革，反复进言，牵裾痛哭，如能使皇上下决心变法，于国家有莫大的功劳。

给潘祖荫的信寄出后，却如石沉大海，再无消息。康有为十分失望，只好把目光转向其他官员。但他对京中官员的情况了解不多。竟然把希望寄托在著名的顽固派代表人物徐桐身上。

徐桐是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曾为同治帝老师，其时为体仁阁大学士，是当时的理学大师。康有为以为他是汉人，且在学界有威望，又曾是帝师，说话有份量，故前去拜访徐桐。但康有为在京师几个月中，到处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以新派人物的面目出现，徐桐也有所闻，所以当康有为求见时，徐桐拒绝见他。康有为还不死心，又连续两次到徐府求见，但均被挡回。康有为只得给徐桐写信，描述当前中

国所面临的危机，希望徐桐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面陈祸乱之由，牵裾痛哭，感悟圣意。而徐桐居然连信函也不屑一顾，遣人将原书信退还并斥责康有为大胆狂生。

康有为受此斥责，心中虽不快，但并不气馁，又投书兵部侍郎曾纪泽，曾纪泽是晚清大吏曾国藩的长子，曾任驻英法俄大臣，思想开明，并能礼贤下士。他收到康有为的信后，对康有为的思想颇感兴趣，于是前往南海会馆拜会康有为。康有为与曾纪泽就澳门问题和中国变法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但因两人地位悬殊，难以深入交谈。

其后，康有为写信求见光绪皇帝的老师兼军机大臣翁同龢，他在信中指责当权的大臣不尽职守，致使中国面临的危机日盛一日。翁同龢虽然与徐桐不同，思想较为开明，但要接受无名之士康有为的建议，未免太失面子，因而也拒绝会见康有为。

康有为还听说都察院都御史祁世长颇有清名，于是给他写了封长信，希望祁世长能如东汉党人一样，变浮靡之风，厉忠义之节，扶士气而维国家。但信投出后又是石沉大海。

康有为四处投书拜访，虽无结果，在京城却掀起轩然大波，招致保守的达官贵人和腐儒劣绅的不满和愤怒。根据康有为考试的试卷，考官们最初认为，以其博学多识，康有为应排名第三。此事为大学士徐桐得知，他认为“如此狂生，不可中”，命主考官将康有为的名字从榜上剔除。结果康有为再次名落孙山。幸好在朋友帮助下，他才能进入国子监旁听，以求深造。

这年满清皇陵附近发生了山崩，其范围达千余丈。康有为深信此种征兆为不祥，再联想到这年黄河泛滥，久决不塞，河南、山东等地人民深受水灾之苦；江淮之间，久旱无雨；广东大水、京师大风，地震山倾；尤其是东北发生特大

洪水，冲及永陵山谷。永陵山谷是满清所谓龙脉发祥之地，遭受洪水冲荡，山川形势全改，岸谷告变，震动非常。康有为感到危乱将至，常掩卷放声痛哭。他决意不顾清朝禁止非官吏的士人直接向皇帝上书的为时已久的规定，不避斧钺之诛，披沥血诚，发愤而撰《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已及时图变折》，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书，极言时危，请求变法改革。这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一书》。

康有为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告诫清廷，中国已经面临亡国危机，有如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又感风疾，百窍迷塞，内溃外侵，朝不保夕，所谓百脉溃败，病入骨髓，即使扁鹊神手，也会望而大忧。尤其令康有为担忧的是皇太后、皇上无图治之心。因而康有为希望皇太后和皇上要励精图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如果朝廷能采纳他的建议进行改革，那么宗社益固，国家可治，清廷亦尊。否则，“四夷逼处于外，乱民作乱于内”，那时清廷再来图治就来不及了。

奏折写成，但身为一介布衣，康有为根本无权向清帝上奏。按清朝惯例，只有少数王公和四品京堂以上的廷臣及封疆大吏才能向皇帝上奏，因而康有为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位向清帝呈递奏折的权臣。但他已在几个高级官吏那里碰了钉子，自己再去找还是要碰壁。幸好他在一批中级官员中找到了知己，如国子监祭酒盛昱、都察院御史屠仁守、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郎中沈曾植等人皆与康有为相交甚好。但当康有为《上清帝书》写好后，原来几个答应代奏者看了上书后，都感到内容太激烈，恐攘祸受其牵连，把上书婉言退回。康有为将上书交给国子监祭酒盛昱，盛昱是位年青的满族学者，性情亢直，慨然允诺设法找人代奏。盛昱与帝师翁同龢相熟，他将康有为的上书呈交给翁同龢，但翁同龢读了

康有为的上书后，认为言辞过于激烈，反而与事无补。同时翁同龢与朝中一些官吏正发生矛盾冲突，他怕为政敌抓住把柄，故谢绝为康有为代奏。盛昱为了不负康有为之托，又持书去见都御史祁世长，请求代奏。祁世长极其称赞盛昱和康有为忠义，同意代奏，并相约于 12 月 10 日到都察院递书。

这一天清晨，康有为起得很早，沐浴焚香，换上干净衣服准备出门。这时，仆人谭柏从门外进来，告诉康有为说菜市口今天要杀人。康有一听，心中闪进一个不祥念头。他想，今日我上书却遇杀人，此为不吉之兆，自己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岂可冒杀头危险，轻易去死？但转而一想，我既决定要救天下之人，死生有命，怎能中途畏缩。于是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而行。但祁世长却临时害怕退却，借口在车上流鼻血，头晕目眩，驱车回府，以生病为由不再赴约。此后康有为四处奔走，进行了多次尝试，但都劳而无功，康有为感到横遭阻格，上书难达，只好作罢。

此次上书虽然未能上达皇太后和皇帝手中，但却在京师很快流传开来，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舆论哗然，《上清帝书》也不胫而走，广为传抄，这使朝中守旧大臣和腐儒士人大为不安，纷纷起而攻击康有为，要求惩办。一时京师谣言四起，甚至有传闻已将康有为交刑部治罪。南海县旅京同乡为免受牵连，主动提出将康有为驱逐出北京。

康有为只得移居七树堂汗漫舫暂避风头。汗漫舫老树蔽天，巨石回廊，小屋如舟，极为幽静，康有为在此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金石凡数千种，撰《广艺舟双楫》一书。

过不多久，康有为又按捺不住寂寞，再次通过屠仁守上书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屠仁守为正统士人出身，笃信宋明理学，忠纯刚直，每

与康有为谈论国事，辄悲痛涕泪。屠仁守是御史，有专折奏事之权，在康有为影响下，多次上书，议论朝政。康有为应屠仁守的请求，也多次代他写奏稿，草拟有《请开言路折》、《请筹银钱折》、《请开清江浦铁路折》、《请醇亲王归政折》、《乞面对折》等，奏请停开海军捐，停止修建颐和园；要醇亲王不再干预政事；罢免宰相，禁止宦官干政；广开言路，变法维新；要慈禧太后速归政于光绪帝。

屠仁守这几个奏折递上去后，无不戮到守旧大臣的痛处，对他恨之入骨。慈禧太后更是暴跳如雷，下旨将他革职，永不叙用，屠仁守毫无怨言，只觉自己讲了应该讲的话。由于朝中大臣不知奏折是康有为起草，故康有为没有受到牵连。

连经几次挫折，康有为感到十分失望。他意识到清廷正在等待灭亡，无可救药，决定舍弃而归，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不再有救国救民之志。但继而想到中国之灭亡已无药可救，又不忍坐视其亡，遂产生出国之念，或到美国讲学，或到巴西经营种植园，作为将来复兴中国之基业。但因缺乏财力，又有老母在上，不忍远游，只得选择了回乡之路。

康有为自京城南归，不意英才群集，再起波澜，此正是：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主要参考资料

《清德宗实录》第 347 卷。

《光绪朝东华录》(三)。

宫玉振：《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中州学刊》1996 年第 3 期。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林国恩：《李鸿章新传》，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5 年版。

《康有为年谱》第 3 卷。

《礼山学记》第 1 卷。

《张延秋先生轶事》。

《康有为诗集》。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南海先生七上书记》。

第 102 回 万木丛中聚生徒 草堂庭下著文章

话说康有为回到阔别年余的家乡，讲堂寥寂，绛帐无存，空有满目青芜，一时百感交集：

上书痛哭叹中原，岂意穷山却扫门！
已净万缘随念尽，更无一法与人言。
讲堂漫有青纱帐，春信偏知黄叶村。
时事近来都绝口，只将风月共君论。

这首赠好友黄季度的诗道出了此时此地他的苦闷心境。

人常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至其于绝境而后方能成大业。欲以天下为己任之人，岂能一帆风顺，率尔成事？故康有为的挫折失望只是一时，历史使命感使其难以终老林泉，一生默默无闻。正所谓“东海之鳖，不可入于井；龙伯之人，不可钓于塘”。这次京城上书失败，很快使康有为悟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国民愚昧，人才缺乏是其重要原因，因而非别造新国之才，不足以救国，俗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决意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才，传播维新思想。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入广州，搬进惠爱街他曾祖父康式鹏的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初到广州，康有为便成为新闻人物。他在京师上书的消息已传遍广东学界，并经传闻一再加以渲染，更成了广东一怪。一般人都不敢贸然与康有为相交。

在广州，康有为一开始在徽州会馆协助石德芬讲授诗文课程，因而得与附近学者接触。

却说广州城内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有一位青年学子陈千秋，听说康有为在京城上书变法之事，对康有为的爱国壮举产生仰慕之情。1890年3月的一天，陈千秋登门以客礼求见。两人初次见面便谈诗论经，十分投机。康有为将自己的新近思想，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详细说与陈千秋听，将考据旧学视为无用之物尽数破弃。这番新奇观念，高谈阔论，令千秋佩服得五体投地。几番交谈后，这年6月，陈千秋正式拜康有为为师，成为康门第一位入室弟子。

陈千秋拜师康有会后，一天遇着学海堂的同窗好友梁启超，便将自己所知康有为的故事及自己如何拜谒康有为之事一一告诉梁启超，并感慨地对梁启超说：“南海康先生的学识你我无法企及！”

这梁启超也是广东一位天才少年，他天资聪颖，机敏过人，在老家广东新会有神童之誉。他6岁读完“四书”及《诗经》，6岁后遍观五经及中国略史，8岁学为文，9岁便能缀千言。11岁考秀才名列前茅，卓越才华令广东学政叶大焯为之叹服。12岁入广州学海堂，师从宿儒耆学陈梅坪，博览群书。16岁便以第8名登举子，可谓少年得志，自然有几分傲气。所以听陈千秋把一个老秀才康有为说得天花乱坠，心中有几分不服，便想见一见这南海康先生是何许人也。

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与康有为在云衢书屋会面。梁启超一开始自恃对时下所推崇的训诂词章之学颇有所知，因而一见面便夸夸其谈，不料康有为将这些数百年奉为正统的旧学统统视为无用，一一加以驳诘，旁征博引，摧陷廓清。这对年少的梁启超无疑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这次会面上

午 8 时到下午 8 时，整整持续了 12 小时。梁启超感觉好像以前立足之基被淘空，茫茫然不知所从。回到住所，梁启超又惊又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陈千秋同宿一室，探讨辩诘，竟至通宵达旦。

第二天一早，梁启超再度赴云衢书屋拜谒康有为，这次与前一日大不相同，梁启超是来请教康有为如何治学，已有意入康门为弟子。康有为乃教以陆、王心学，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从此梁启超告别旧学，始知世间学问原来是另外一回事。这一来自然对康有为奉为指南，正式拜在康门之下。

陈千秋、梁启超拜师后，认为康门应自成一派，便建议康有为另创一所学堂，以育天下有志少年。这正中康有为之意。康有为对同治光绪以来的政治学风早已不满，正想通过办学来建立一种积极进取、平等博爱的学术思想体系，以负起领导政治革新的责任。同时培养学问渊博，思想自由，胸怀开阔，眼光远大，勇于牺牲，能担当大任的政治人才，以促进政治改革，使中国富强康乐。所以师生一拍即合，于 1891 年在广州长兴里设堂讲学，是为万木草堂之始。康有为著《长兴学记》，作为教育纲领。一开始学生不多，除陈千秋、梁启超而外，另有韩文举、梁朝杰、徐勤、麦孟华、曹泰、王觉任、韩德基等十余人。规模虽小，而于当日学界却是别开生面，另成一体。

清代正统教育向以书院为主体，然书院一开始即为科举服务的附庸，专课八股，不讲有用的学问。到两广总督阮元 1824 年创设学海堂，开始专讲经诂实学，不课八股，发生了一次变革。以后也有少数学者起而效法，但由于政治上的禁忌，他们所讲的实学与实际社会所需尚有很大距离。这种趋势，迄张之洞创设尊经、广雅、两湖等书院，讲授经世之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才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张之洞日后又